

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历史分期、学术范式与跨文化再创造

汪 洋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历时近百年，是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传播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之一。日本不仅在时间上最早大规模译介鲁迅作品，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日本鲁迅学”传统，其译介与研究的深度在世界诸国中独树一帜。本文综合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接受美学以及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相关视角，对鲁迅在日本的译介过程进行阶段性梳理，并重点分析各阶段译介背后的杜会政治语境与文化心理机制作出的塑形作用。同时，考察以竹内好、九山昇、伊藤虎九、藤井省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如何在译介与阐释实践中建构不同的“鲁迅像”，从而揭示译介并非中性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与日本自身思想史、知识版图密切纠缠的文化再创造过程。最后，从方法论和实践层面讨论日本鲁迅译介经验对中国本土鲁迅研究以及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关键词：鲁迅；日本；译介传播；跨文化再创造；学术范式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传播史中，鲁迅无疑占据着标志性的地位。与多数在海外“昙花一现”的作家不同，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呈现出高度的持续性和结构化特征，译本数量庞大，研究队伍稳定，相关成果甚至已经渗透进日本中学与大学的文学教育之中，被广泛视为“最为日本读者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本文的分析立足于两个相互补充的理论视角，其一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强调文学作品的“他国旅行”必然嵌入特定的权力关系与文化结构之中；其二是描述性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应当被视为目标文化内部系统中一种有规可循的行为，而非对原作的简单再现。

1 鲁迅在日本译介的历史分期与阶段特征

1.1 20世纪20年代：译介萌动期

鲁迅与日本的直接接触可以追溯到其留日期间，但作品意义上的“入日”则主要发生在1920年代。萌动期的鲁迅译介主要具有三个特点。首先，译介主体较为分散，多为具有中国留学或汉学背景的个别学者或记者，他们往往通过报刊节译的形式介绍鲁迅的小说或杂文，尚未形成系统的出版计划。其次，选材上偏重社会批判色彩较强的短篇作品。第三，评论语境较为简单，鲁迅多被归入“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的范畴，其思想与美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术主题。尽管这一阶段的译介数量有限，但其标志性意义在于鲁迅不再只是作为个体留学生的身影出现在日本，

而是作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一种象征性话语被日本读者知晓，为后续更大规模、更系统的译介奠定了初步的读者基础。

1.2 30年代：政治高压下的译介发展期

进入30年代，日本国内左翼运动在压制中反复起伏，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阅读也由此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一方面，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视鲁迅为批判旧制度、同情被压迫者的“战友”，主动翻译并推介其作品，以期借助中国革命经验来思考日本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军国主义与国家机器则试图利用有关鲁迅及中国社会的论述来构建对外与对内的意识形态论述。这一时期内容较为完整的鲁迅小说译本陆续出现。同时，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讨论中，也经常借用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为论证材料，从而在无形中强化了鲁迅被当作“中国整体”的象征来阅读的倾向。这样的阅读方式在战后虽受到反思，却深刻影响了日本早期对鲁迅的总体认知框架。

1.3 1950—60年代：战后繁盛期与“鲁迅学”的奠基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进入对战争责任和现代化道路的集体反思时期。从译介的角度看，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出版机构的大规模介入。通过岩波书店、学研社等机构的努力，小说、杂文、散文、书信、日记等多种体裁的鲁迅作品得以全面进入日本市场，译者队伍也愈发专业化。

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开始从简单评论走向学术化。竹内好在《鲁迅》中提出“文学者鲁迅”的概念，强调鲁迅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政治立场，更在于他以文学的方式不断逼视时代与自我，体现了东亚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的主体性追问。丸山昇则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生产机制的细致考察，揭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学中的复杂位置。可以说，50—60年代不仅是鲁迅译介的量的高峰，更是日本“鲁迅学”在学术意义上完成奠基的时期。

1.4 70—80年代：理论深化与范式转型

到了70—8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逐渐摆脱单一的政治解读框架，转向对鲁迅思想内部结构与现代性问题的深入讨论。伊藤虎丸的研究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他在《鲁迅与终末论》中提出鲁迅在早年阅读尼采、屠格涅夫和俄国宗教思想时，已经形成一种带有“终末论”色彩的“个”的自觉意识^[7]。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更加重视鲁迅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对《呐喊》《彷徨》中叙事视角的分析、对杂文中话语策略与讽刺艺术的梳理、对鲁迅日记与书信的细读等。此时期的译介也呈现精细化特征，不少经典作品出现了新译本，以更贴近当代日语语感的方式重新进入读者视野。

1.5 90年代以来：多元化与东亚视野下的新展开

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进入后工业化与消费社会阶段，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藤井省三等学者开始从“东亚文学环流”的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更加关注普通读者对鲁迅的接受过程，包括鲁迅作品在日本语文教材中的选用、在大众媒体中的再现等日常化层面。鲁迅在日本不再只是“严肃政治”或“学术研究”的专属对象，而逐渐成为可以被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以多种方式理解和再利用的文化资源。

2 日本鲁迅研究的学术范式与“日本鲁迅像”的生成

2.1 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范式

竹内好被普遍视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精神旗帜。他在《鲁迅》中强调，鲁迅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他以“文学者”的身份始终保持对现实的深度怀疑与反思。竹内将鲁迅的“回心”视为一种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内在运动，从而将鲁迅塑造成在东亚现代性语境中坚持精神独立的典型^[4]。这种理解一方面突破了将鲁迅简单等同

于“革命文学家”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竹内本人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暴力和个人责任的思考。

2.2 丸山昇的“革命·历史”范式

与竹内偏重哲学思辨不同，丸山昇则以扎实的史料工作见长。他通过长期追踪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坛与文学刊物的互动关系，将鲁迅放在中国革命文学整体生产机制中加以考察。在丸山笔下，鲁迅既是参与革命事业的“革命人”，又是始终保持批判距离的“知识分子”。这种以历史实证与内在批判并重的范式，使得鲁迅不再被简单贴上“革命旗手”的标签，而是被呈现为一个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艰难选择的历史行动者。这为中国学界后来反思“革命鲁迅”的单一化形象提供了重要参照。

2.3 伊藤虎丸的“个的自觉”与终末论视角

伊藤虎丸将鲁迅与“终末论”相联系，提出鲁迅思想深处存在一种对“旧世界终结”的预感及其所带来的个人精神撕裂。在他看来，鲁迅从青年时期起便在西方哲学、俄国文学和中国传统之间进行剧烈的精神搏斗，从而形成一种以“个的自觉”为核心的思想结构^[7]。这一范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民族主义鲁迅”或“阶级斗争鲁迅”的框架，凸显了鲁迅在个人存在论层面的痛感与迷惘，使鲁迅被纳入更广阔的世界思想史脉络中去理解，也为国内鲁迅研究提供了难以在本土语境中自然生成的视角。

2.4 藤井省三的“东亚鲁迅”与读者史视野

藤井省三在《鲁迅——東アジアを生きる文学》中将鲁迅视作“在东亚空间中生存与思考的作家”，他不仅关心鲁迅创作本身，更关注鲁迅作品在不同历史阶段被怎样放入日本读者的日常经验与文化记忆之中。藤井将鲁迅研究从“作品—作者”关系推进到“作品—读者—媒介”的三元结构之中，揭示了鲁迅在日本作为一种“现代经典”的运行方式，既是教科书中的课文，又是电视纪录片、文学讲座和学术研讨的对象，在不同层级形成相互交织的接受谱系。

3 译介中的文化再创造：从“误读”到“他者之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日本对鲁迅的译介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忠实再现”，而是一种深受时代氛围、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制约的再创造过程。其一，“误译”与“偏读”并非偶然失误，而是目标文化通过鲁迅来表达自身诉求的必然结果。例如，20世纪30年代部分译者刻意强调鲁迅对

“国民性”的批判，将其理解为对中国整体落后性的揭露；战后则将这种批判强烈转置为对日本战前军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反思。其二，在不同阶段，日本读者所接受的往往是“被加工过的鲁迅”。出版机构的选篇策略、译者的注释与前言、评论者的导读文章共同塑造了“该如何阅读鲁迅”的框架。其三，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日本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学界重新审视自身鲁迅研究的一面镜子，日本学者提出的“终末论”“个的自觉”“东亚现代经典”等概念，恰恰提示我们鲁迅文本中尚待挖掘的多重向度。

4 日本鲁迅译介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鲁迅在日本译介传播的百年历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范本。首先，文学外传的前提是目标文化的现实需求与问题意识。鲁迅在日本能够长久“活下去”，并非依赖某种行政推动，而是因为其作品持续触碰日本知识界的关键问题——战争责任、现代性危机、知识分子角色等。当代中国文学若要在海外产生类似影响，也必须找到与对方社会现实产生共振的议题，而非仅满足于形式上的翻译数量。

其次，稳固而专业的学术共同体是文学传播的保障。日本鲁迅学的形成依赖于大学中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梯队，以及与之配套的教学与出版体系。相比之下，许多国家的中国文学译介仍停留在少数个人爱好者的努力层面，缺乏制度化支持。我们在推动文学走向世界时，应更加重视与海外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支持当地形成稳定的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力量，而不仅仅是“输出成书”。

再次，必须承认并接纳跨文化传播中的“变异”与“再创造”。鲁迅在日本的多种形象表明，任何文本进入他国文化后都不可避免地被重新编码、置换与再阐释。以“防止误读”为唯一标准并不现实，更好的态度是在尊重原作核心精神的前提下，鼓励多样化的理解，并通过持续对话引导这种差异性走向建设性的方向。

最后，日本的经验还表明，一位作家在海外的经典化，往往是一个跨媒介、跨世代、跨层级的渐进过程，从学术研究到教材选编，再到大众媒体再现，缺一不可。若“走出去”的实践若过度着眼于名著翻译的短期效果，而忽略

与目标语社会长期互动与深耕，难以形成类似鲁迅在日本那样的深层影响。

5 结语

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史，实际上是一部涵盖翻译实践、学术研究与文化互动的综合性历史。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零星介绍，到战后“鲁迅学”的体系统合，再到 90 年代以来的多元化与东亚视野展开，鲁迅在日本的形象始终处于流动与生成之中。本文通过历史分期与学术范式分析，试图展示日本如何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不断建构“日本鲁迅”，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中国本土鲁迅研究的路径选择。在全球化与区域政治格局重构的当下，重新审视鲁迅在日本的译介史，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鲁迅“世界性”的理解，更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长期机制与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 [1] 程麻. 日本的鲁迅研究近况 [J]. 国外社会科学. 1981(09):31-36.
- [2] 刘伟. 二十世纪日本鲁迅研究的三次转向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02):110-115.
- [3] 陆晓燕编译. 日本鲁迅研究史料编年(1920-1936) [A].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 鲁迅研究资料(13) [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 [4] 李志. 日本的鲁迅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7,(04):138-142.
- [5] 周令飞. 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222-229.
- [6] 张梦阳. 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J]. 文艺研究. 2006(12):38-43、167.
- [7] (日) 伊藤虎丸著, 李冬木译. 鲁迅与终末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8] (日) 尾崎文昭、薛羽.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 [J]. 现代中文学刊. 2011(03):49-56.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鲁迅在日本的译介传播”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N2022031。）